

二十国集团：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托马斯·弗斯（Thomas Fues）博士

1. 引言

我们脆弱的小行星爆发的经济与环境危机，突出了一个新的全球治理架构的必要性，它在政治层面反映了朝着多极化的不可抵抗的转变，同时促进了朝着低碳经济和人类可持续繁荣的结构转型。正如人们如今普遍认识到的，西方国家的历史悠久的统治地位结束了。新兴大国，尤其是亚洲的大国，成为了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而欧洲国家仍然必须充分意识到它们在国际力量关系中的相对衰弱。和二战后具有等级式结构的两极秩序相比较，如今相互依存性的加深、权力的扩散以及行为体的大幅增加，使得全球决策变得复杂化。

如今，由于合作多边主义受到侵蚀，逐步升级的跨越边界的威胁加重了，正如最近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惨败所证明的。在传统大国以及新兴大国的复兴的民族热情的刺激下，提供基本的全球公共产品的集体努力似乎在撤退。至今还不清楚的是，新建立的由国家与政府首脑组成的二十国集团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认同，作为全球福祉的监护人，或者反之，运作为旧式对抗与国家实力斗争的空间。另外，还有

待观察的是，在何种程度上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还有来自公民社会以及企业部门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对全球问题的解决方式的设计、实施及其结果产生影响。

本文研究这个新峰会架构——它于2008年秋季在国际金融市场坍塌后出人意料地产生——的当前形式以及至今未解决的矛盾。文章将谈及俱乐部治理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论述效果与合法性之间以及国家私利与全球责任之间的内在张力。文章最后结合二十国集团作为可预见未来的对话和政策协调的首要论坛的潜力，探究欧洲国家与新兴大国的特殊角色与贡献。

2. 处在转折点的峰会架构

2008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峰会架构的突然的、出人意料的转变。几乎一夜之间，主要工业国家选择把二十

托马斯·弗斯（Thomas Fues）博士，波恩德国发展政策研究院培训部主管，研究兴趣在全球治理，新兴国家，联合国，国际发展合作。

*本文基于在“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该国际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协调项目办公室于2010年4月7日至8日在上海举办。作者在此真诚感谢研讨会的主办方以及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感谢他们令人启发的讨论。

国集团（G-20）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升到全球体系的顶点，尽管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集团的构成反映了对1987-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从1975年以来主导着全球政策协调的八国集团（G-8），丧失了其最初的目的与功能，如今看上去更像是某组国家的次级的秘密会议。新兴大国恰当地宣称，二十国集团不能被理解为八国集团的扩大，而是一个新事物，它预示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它们对不可逆转的力量转变的认可和接受，工业国家最好迅速整体解散八国集团，这也将有助于限制由于各类峰会增生而造成的领导人日程安排方面的过剩需求。

为了更好地领会政治变革的空前速度，可以看一下所谓的海利根达姆对话进程的命运，它是在2007年八国集团峰会期间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倡议提出的（Cooper/Antkiewicz 2008）。不顾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明确反对，在这个波罗的海度假胜地，默克尔建立了一个向五个新兴大国（即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扩展的制度化版本（Fues/Leininger 2008）。这个进程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创新但在开始时有争议的步骤，在短短数年左右就随着领导人层面的二十国集团的出现而被边缘化了。2009年做出的把海利根达姆的授权再延长两年的决定，并不能掩盖这个倡议事实上的死亡，这也反映在经合组织（OECD）中的海利根达姆秘书处宣布关闭上。如今，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愿意在二十国集团框架里与工业国家以及与它们的南半球同类国家在平等层面上互动，而不愿意在一个由其他国家控制的脚本中出演一个配角。

虽然二十国集团迅速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平台，但是这个新的峰会架构的具体形式与影响范围仍然是不确定的。无论是集团内部的力量关系，还是它打算追求的具体使命，都还未解决。新兴大国最初跟随其直觉，慎重前行并以更为响应的方式作为。随着它们越来越熟悉这个机制，并扩大它们与同道的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它们不久就有望在有关议程和结果的集体利益代表上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发展中国家成员

之间的目标的统一，必然延伸至希望给予二十国集团某些授权。二十国集团这个领导人论坛是否应把自己局限在经济与金融议题，抑或该集团在向全球性发展议题开放（见下文）以外，应承担针对全球事务的更广泛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至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国家均未做出明确定位。

在一个更加根本的意义里，二十国集团的认同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成员国们是想要把自己看作全球福祉的监护人，还是把二十国集团看作各国故作姿态以及平衡力量的舞台？可以说，八国集团过去的努力中所做的一件好事，是该集团对穷国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承诺（Chandy et al. 2010）。相反，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中明显缺乏这类伦理基础，至少目前如此。考虑到全球挑战的互联性以及缺少国际领导阶层，看来值得希望的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选择一种综合性的方案。峰会在全世界大多数公众眼里的合法性，当然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致力于普遍关切的。为了增强其在成员资格和主题实质方面的包容特征，二十国集团应腾出空间给低收入国家（例如非洲联盟）的集体代表（Suruma 2010）。

显然，二十国集团的合法性以及公共接受度也取决于它在其所有行动中所遵循的质量水准。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化的世界中，所有的全球治理行为体必须满足人们在透明度与问责性方面的高期待。必须向非国家实体，尤其是来自公民社会以及企业部门的行为体，提供政策对话的渠道以及多利益相关者倡议行动。显而易见的是，二十国集团若要取得长期成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导阶层准则，以及一个秘书处的制度化支持结构。这方面艰难的决定在于表决方式以及任职期。从组织角度而言，秘书处所在位置的选择将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且是高度争夺的。韩国可以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原因在于该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成就，另外，它是经合组织及其附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在东亚。

3.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

发展中世界对这一新的峰会架构给南半球国家可能带来的影响日益关切，作为对此的回应，二十国集团最近开始把其关注点转向全球发展的特别挑战（ODI 2009）。尽管到当时为止，二十国集团的核心使命聚焦在世界经济均衡而又可持续的增长，但是，二十国集团在2010年6月召开的多伦多峰会上设立了一个有关发展议题的工作小组。即将举行的首尔峰会（2010年11月11日至12日）预计会通过一份内容广泛的发展议程以及用以实施的若干年行动计划。聚焦点的扩展预示着二十国集团的使命朝着发展中世界的重要转变（Kharas 2010）。通过把均衡的概念扩展到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任务上，反映了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日益增长的承诺，为普遍的福祉以及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广泛的责任与义务。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只是在某些狭义聚焦的二十国集团倡议行动中所述及。

二十国集团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影响，将是未来数年里学者、决策者和大众的关注点所在（Payne 2010）。例如在以下政策议题方面：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以及与气候议程的关联；金融部门的改革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战略角色；贸易、投资与就业的促进；私人资金流的透明度以及同资本外流、逃税和腐败等做斗争方面的国际规则、水准与机构。二十国集团的合法性，间接地还有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峰会结构的承诺，即促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Fues/Wolff 2010）。

4. 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

通过在最高行政首脑层面自愿接受二十国集团的成员资格，所有参与国都同意在全球治理中担任领导角色。因此，它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微妙的挑战，即必须

长久地在本国私利与全球责任之间进行均衡。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启动阶段在这个方面的表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反映了国际体系中不顺利的发展变化。对狭隘的短期目标的追求日益成为这个政府间过程的主导特征。尤其令欧洲观察家感到不安的是美国和新兴大国推行的对绝对主权的主张的相互增强，以及它们相伴拒绝就问题解决战略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欧洲的有效多边主义倾向——这是从欧洲大陆痛苦的历史经验中发展而来——成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笑柄。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全球权力政治中成为局外人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令欧洲大陆感到震惊。由于欧洲利益的不充分代表以及组建联盟方面的彻底失败，建立全球碳排放机制作为东京议定书后续措施的方案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相反，美国与新兴大国达成了一份强调各国自愿措施的最终文件，并把这份文件强加给了大会。

全球治理中的其他趋势也同样令人不安。全球体系的特征在于日益加剧的机构碎片化以及行为体扩散，其中有益的有实力雄厚的发展基金会，有害的有诸如跨国犯罪网络。此外，全球治理架构缺少一致性，这是因为部门机制遵循它们自己的逻辑与规则。尽管在全球层面建立了有意义的伦理基础，包括法律形式的人权与劳工标准公约，以及以软法形式由联合国大会2000年通过的《千年宣言》，但是规范性框架的影响是弱的，这是因为各成员国随心所欲地忽视这些规范性框架，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监督方面的巨大缺口以及惩罚机制的完全缺失（国际证券与贸易除外）在结构上给予追逐本国私利而不完整行使主权以优先权，优先于对“开明的”主权的包容式理解（加拿大首相斯蒂芬·哈珀），这种理解同等强调全球责任和多边合作。

总体上，全球事务可以合适地用系统性风险和应对与管理这些风险的各种治理结构之间的日益不匹配来描述（Messner et al. 2009）。到目前为止，二十国集团还未上升到领导力挑战，把自己局限在某些半心半意的补救经济萧条的措施上。倘若成员国坚持这

一行为方式，它们无疑将马上面临对其缺陷的批评性审视，这种审视既来自于它们本国内部，也来自于世界上被排除在集团外的国家。

5. 联合国与俱乐部治理

倘若二十国集团不愿执行全球领导的工作，那么我们还可以求助于谁？而且，首先要澄清的是，二十国集团作为如今俱乐部治理的又一个化身，是否可被视作是合法的玩家？许多小国或穷国的政府行为体对峰会架构表示深深怀疑（Cooper 2010）。它们坚持联合国在全球商议和共识建立过程中扮演首要角色。一个由23个来自北半球和南半球的较小型国家与中等规模国家——它们把自己称作3G，这是Global Governance Group（全球治理集团）首字母缩写——最近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正式抗议（UN 2010），但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小国并未签名附和这一倡议行动。这个在新加坡领导下的非正式联盟明确表达了其忧惧，即二十国集团或许会使联合国相形见绌，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一个关键的决策角色。这个3G集团要求把联合国秘书长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及其准备活动加以程式化，并要求在特定议题上，把非二十国集团国家包容进来。此外，它们建议，诸如非洲联盟或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地区组织应成为正式参与方。参加这个倡议行动的发展中国家明显焦虑的是，7个参加二十国集团但同时又是77个发展中国家集团成员的国家可能会与更穷的国家疏远，转而致力于在工业国家面前捍卫其自身的经济利益（Deen 2010）。

尽管坚持192国家集团（指的是联合国成员国总数）拥有惟一合法性的主张具有相当大的分量，但是，普遍性的拥护者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处在深刻的危机状态之中。无论人们在哪里观察，看不到任何对在联合国体系里讨论的议题进行改革的欲望。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只是部分解释了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对和平与全球进步等理想的渴望——它们被庄严载入了开创性文

件，如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往往与各个成员国对短浅的本国目标的追逐相冲突。虽然这个组织的（输入）合法性由于普遍成员资格而超常存在，但是，其在全球问题解决中的效果受到结构性缺陷的限制。主权平等（一国一票）的传统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除了安理会——在形式上把12000名人口的图瓦卢的波利尼西亚人国家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放在平等地位。有效多边行动的另一个障碍在于在安理会以外的政府间决策过程通常遵循的共识原则。遗憾的是，美国出名的是，就每个人类关切通过雄心勃勃的决议，但是在实施与结果方面却彻底失败。在哥本哈根大溃败使人们的幻想破灭后，许多观察家从根本上怀疑，联合国内部无组织的、混乱的多边进程在对日益稀有的资源展开日益激烈的争夺中究竟还有无能力带来切实的结果。

另外一个事实是，除二十国集团以外，在联合国范围以外的俱乐部治理呈增长态势。新兴大国尤其喜好建立新的形式，由此带来了使得联合国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Bissio 2010）。最近新增加的政府间“字母汤”包括IBSA（印度、巴西、南非）、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和SCO（上海合作组织）。尽管这些联盟自然给参与国带来了可贵的收益，但是它们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合法性与效果之间的张力并未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适当地管理。

从规范性视角以及功能性视角来看，似乎有必要把二十国集团或类似组织纳入到联合国体系中。否则，被排斥在外的国家预计会抵制这些它们未曾在设计阶段起作用的全球架构。一个专家委员会最近建议联合国设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承担二十国集团的功能（UN 2009b）。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建议。尽管公民行为体支持这个主意，但是各国政府至今普遍回避赋予联合国在经济事务中的权限。放眼多边主义的僵局，看来渐进的步骤是不够的。因此，某些学者要求实施重组世界秩序的宏伟计

划，就如同二战后建立联合国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上的努力那样（Maxwell/Messner 2008）。

许多决策者与学者坚持主张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先地位，这不能否认在联合国这个普遍结构以外的多行为体的临时倡议行动的有效性与功能。例如，在全球气候外交方面，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多层级方案，以克服国际僵局（WBGU 2010）。尽管这些学者们支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京议定书II）之下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减排的全球协定，但他们同时鼓励组建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前沿性创新联盟，并表示喜好由下至上形成的、来自公民社会与企业部门的多利益相关者倡议行动，作为补充性方案。

6. 欧洲在世界新秩序中的角色

欧盟有5亿人口，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30%。作为一个经济巨人，欧盟却日益发现自己在全球政治中被边缘化了。随着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半球，欧盟27个成员国仍未解决它们作为全球行为体的集体认同问题（Mahbubani 2010）。甚至于在2009年年末《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尽管设立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新职务，欧洲在关键国际议题上的立场通常是有分歧的，且多半在全球权力政治方面是不重要的。外交的再民族国家化的普遍趋势也影响着欧洲，对此的证明是，在二十国集团中，与欧洲机构的参与相平行的是，欧洲各国在突出自己的本国利益。

欧洲国家还在坚持其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影响的旧有定位，但这种定位不再与当今权力分布相当。由此，它们变成了实施有意义的改革的一个严重障碍，这类改革包括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重新分配表决权。这尤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是如此，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例证的，欧盟在该组织的累计表决权合计为32%。欧洲应就其在全球体系中的适当代表下定决心，且宁早莫晚。它得思考，它是想通过减少自己的分量来为一个公平的秩序作出贡献，还是决

心坚持与时代不相符的特权地位？幸运的是，缩小欧洲的表决权的适当的一步已经在世界银行迈出，这导致德国把自己表决权方面排第三的位置让给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提高了3%，使得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投票权比例总计达到47%。

欧洲可以为全球治理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建立基于主权共享的超国家机构的经验（Hill 2010）。作为《里斯本条约》组成部分的《基本权利宪章》，在源自于欧盟条约的更为传统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以及欧盟公民权利以外，还包含基本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由此开辟了新天地。给欧洲大陆提供一个单一的规范框架，这可以被解读为迈向欧洲公民身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另一个相关的欧洲的经验在于广泛地把非国家行为体纳入政策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尤其是着眼于利用公民社会的优势与资源。

7.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

新兴大国作为全球舞台不可缺少的玩家出现了。它们的新分量需要得到工业国家在设计未来全球治理机制时的认可（Freemantle/Stevens 2010）。在规范性方面，所有主要文明的价值体系必须得到反映，而不应像过去所发生的那样，追随西方国家的处方。但是，上升到顶点也意涵着，来自南半球的主要大国必须准备好依据其国家的能力，承担起全球责任（“共同却相区别的责任”，1992年地球峰会宣言）。通过加入二十国集团，它们自愿接受了全球领导的特权与义务，这也包括接受了公平地分担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负担。正如上面详细描述，本国私利与全球关切之间的均衡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实施，这对于许多工业国家也是如此。国际范围的职责以及有约束力的承诺被系统地规避了；新兴大国对国际政策协调与统一的贡献通常是不充分的（Castaneda 2010）。这可以通过援引环境保护、人权、社会福利与反腐方面的全球标准来例证，诸如采掘垦殖工业透明倡议行动（EITI）、银行业的赤道原则，或者有关企业可持续

发展准则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但是，也可以观察到，南半球大国也日益多地被纳入规范制定过程，正如新的、有关社会责任的ISO 26000标准所见证的。

由于发展中国家掌握着联合国的多数表决权，它们掌握着在联合国取得实质结果的关键，因此，联合国的未来角色严重依赖于新兴大国的态度与政策。从目前的实践来判断，可以设想，它们对这个世界组织投入的信任很少，且准备给予适当的政治与财政支持，尽管它们在言辞上因为联合国恐怕是全球体系不可缺少的关键而对联合国大加赞扬。这一矛盾心态的一个例子可以在正在进行中的、致力于整个系统的凝聚力的进程中找到，这个进程的目的在于改革联合国的发展架构（UN 2006）。由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漠不关心或完全对抗，至今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这使得低收入的成员国丧失了潜在的收益。新兴大国对联合国缺乏信任也体现在它们对联合国各个发展事务署的业务活动的适度捐助上：2007年（有官方数据的最后年份），中国向联合国仅提供了4910万美元，巴西为4880万美元、印度为3060万美元（UN 2009b: 22）。西方国家所提供的资源处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美国以每年27.8亿美元居首，其后是英国（11.5亿美元）。

新兴大国也必须澄清其作为越来越多地向更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源的发展伙伴的角色（“新兴捐赠人”）。到目前为止，它们由于担心来自外部的审查以及由于担心丧失主权，不愿意做出使它们的“援助”计划全面透明和可问责的承诺。而且，至今为止，它们也未充分支持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属的发展合作论坛，以至于它无法履行其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跨所有群体的对话、经验交流与相互学习的首要论坛的使命。模棱两可也通常是南半球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公民社会行为体的特有的态度。在对国际事务中的透明度和问责性的抑制被克服前，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新的重量级国家将无法实现其作为

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的共同创造者的全部潜能。

8. 结论与展望

倘若全球机制要变得能够适应21世纪的各种挑战，那么，在各方面均需要新态度以及改变了的伦理取向；一切照常是不够的。服务于全部社会的愿望的有效全球治理，要求包容性共识达成和有效政策实施的新形式。在此，二十国集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通过探寻可能存在的共识的轨迹，然后把这一共识提交给比如联合国等普遍性机构以正式做出决策。此外，二十国集团应改变其运作惯例，即通过接触广泛的行为体，从俱乐部外交转向网络外交（Heine 2010）。而且不能忽视的是，二十国集团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可以在于，为新时代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即美中关系（两国集团G-2）提供一个建设性的环境。为了确保全球稳定，两个超级大国必须会依赖能够缓和它们之间的对抗并允许它们达成妥协而无丢脸危险的多边机制（Dyer 2010）。

参考文献：

- Bissio, Beatriz (2010): Emerging Powers Cooking Up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 Press Service, 16 April, Rio de Janeiro: IPS
- Castaneda, Jorge G. (2010): Not Ready for Prime Time: Why Including Emerging Powers at the Helm Would Hurt Global Governance, in: Foreign Affairs, 89: 5
- Chandy, Laurence / Geoffrey Gertz / Kemal Dervis (2010):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ow the G-20 May Help the World's Poor, 12 April,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ooper, Andrew / Agata Antkiewicz (eds.) (2008):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Heiligendamm process, Waterloo/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Andrew (2010): The G20 as an improvised crisis committee and/or a contested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 3, 741-757

- Deen, Thalif (2010): G20: Big powers under scrutiny by smaller nations, Inter Press Service, 23 March, New York: IPS
- Dyer, Geoff (2010): Big developing states can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Financial Times, 28 April
- Freemantle, Simon / Simon Stevens (2010): BRIC and Africa: BRIC summit underlines changing global architecture, 19 April, Johannesburg: Standard Bank
- Fues, Thomas / Julia Leininger (2008): Germany and the Heiligendamm process, in: Andrew Cooper / Antkiewicz, Agata (ed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Heiligendamm process, Waterloo/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35-267
- Fues, Thomas / Peter Wolff (ed.): G20 and global development: How can the new summit architecture promote pro-poor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 Heine, Jorge (2010): Will they have table manners? The G20, emerging power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i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 1, 1-11
- Hill, Stephen (2010): 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haras, Homi (2010): Passing the Development Football From the G8 to the G-20, in: Paul Blustein et al., Recovery or relapse? The role of the G20 in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0-12
- Mahubani, Kishore (2010): Europe's Errors, in: Time Magazine, March 8, 20
- Messner, Dirk / Enrique Saravia / Elisabeth Sidiropoulos / Yizhou Wang (2009): Globalisation at the crossroad: An "International Panel on Systemic Risk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 needed, Briefing Paper 6/2009,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ed.) (2009): A Development Charter for the G-20, London: ODI
- Payne, Anthony (2010): How many Gs are there in 'global governance' after the crisi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rginal majority' of the world's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 3, 729-740
- Simon, Maxwell / Dirk Messner (2008): A new global order: Bretton Woods II and San Francisco II, in: Open Democracy, 13. November 2008 (<http://www.opendemocracy.net>)
- Suruma, Ezra (2010): It's Time for Africa's Voice in the G-20, in: Paul Blustein et al., Recovery or relapse? The role of the G20 in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3-14
- UN (United Nations) (2006): Delivering as On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UN System-wide Coherence, in the Areas of Developmen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UN doc. A/61/583, New York: UN
- UN (2009a):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financing of operational activitie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or 200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ument A/64/75-E/2009/59, New York: UN
- UN (2009b):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September 22, New York: UN
- UN (2010): Letter dated 11 March 2010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Singapo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 A/64/706, New York: UN
- WBGU (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0): Climate Policy Post-Copenhagen: Action at three levels offers prospect of success, Policy Paper 6, Berlin: WBGU

Abou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a private cultural non-profit institution committed to the ideas and basic values of social democracy. It was founded in 1925 and aims to furthe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duca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nects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with partner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FES strives for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pluralism, rule of law, social justice and non-violen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different societies.

Learn more about FES: www.fes.de
Learn more about FES in China: www.feschina.net

Contac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ijing), Ta Yuan Diplomatic Compound, Building 5, Entrance 1, 12th Floor, Office 5-1-121, Xin Dong Lu 1/Chao Yang Qu, 100600 Beijing, VR China, e-mail: fesbeijing@fesbj.co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 An Plaza East Tower, 829 Yan An Zhong Lu, Shanghai 200040, VR China, e-mail: info@feschina.net

Briefing Paper

To subscribe the Briefing Papers send an e-mail to: subscribe@feschina.net
To unsubscribe send an e-mail to: unsubscribe@feschina.net

The opinion voiced in this publication is that of the author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Responsible: Dr. Rudolf Traub-Merz, Resident Director, FES Shanghai Coordination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